

〔澳〕J·布鲁斯·家博 著 严安林 译

台湾乡村地方政治

南京大学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11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澳大利亚台湾问题研究专家家博的一部力作，也是国内外第一本研究当代台湾乡村地方政治学术的著作。作者运用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以西方学者特有的视角，详尽考察了台湾地方派系的成因、缘起及其发展，探讨了地方派系结构及联结派系的同乡、同学、同事等各种关系。同时披露了国民党操纵地方选举的真相及由此引起的与地方政治领导人的严重冲突。最后以较多篇幅，具体地描述了台湾地方选举的详尽过程及其内幕。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对了解台湾乡村、人民生活、社会习俗均有帮助，读来引人入胜。

责任编辑 李曾沛

台湾乡村地方政治

澳(太)亚)家博 著

严安梅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42千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305-01528-8/D·220

定价 4.80元

中译本序言

学者的任务有两个：（1）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2）追求真理。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全世界的学者都应当合作，以克服各国之间的人为隔阂来完成我们的学术任务。不幸的是，语言的差异常常阻碍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所以我非常欢迎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并期待中国同事的批评和指教。

作者本人往往很难知道读者对他的书会有什么兴趣。我估计中国读者会强调本书内容的两个方面。第一，我早就想探讨中国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乡村里相当长时间的“蹲点”（从1971年到1980年，我在那里呆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有三年），给了我考察和分析这个问题的机会。西方学术界认为，我对中国“关系”和“派系”这两个概念所下的定义以及我对这两个概念在实际中的运用所做的分析有独到之处。也许处于中国文化圈里的中国同事不会这么看，但是，有时旁观者清。我希望得到中国同事的批评和指教。如果我的理论能引起一场学术辩论，那将有益于上述两项学术任务的完成。

第二，中国同事可能对本书描述和分析的台湾情况有兴趣。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的三中全会，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和台湾差不多没有来往。在这种情况下，海峡两岸缺乏基本的互相认识 and 了解。大陆有名的台籍领导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副主席李纯清发表在1979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文章证明了这

一点。文章提到：“由于台湾和大陆长久被遮断，正如台胞不了解祖国一样，大陆同胞对台湾和台湾人也不太了解。许多人误认为台湾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不知道台湾居民97%是汉族。”当然，从这篇文章的发表到现在，海峡两岸的来往发展得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同时也增加了互相认识 and 了解。我认为，互相认识和了解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基本前提之一。也许这本书会增加大陆对台湾的认识和了解。

一名学者需要依靠同事和朋友才能完成一项大的研究工作。在英文版中我已经对不少人表示感谢。对中译本的出版，我应该向两位中国朋友表示特别的谢意：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茅家琦教授和严安林先生。茅教授不但是中国研究太平天国和晚清历史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大陆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之一。茅老师不但是我的学术长辈，也是我的私人朋友。严先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中国博士研究生。本书的一些概念比较抽象复杂，我很佩服严先生翻译本书的能力和 spirit。

我希望这本书能抛砖引玉，引起读者考虑一些新的问题。那将会促进上述两项学术任务的完成。

家博 1992年3月15日于澳大利亚

墨尔本

序 言

国外的评论家大多认为，以个人间的特殊联系来说明中国政治的变动比说明西方政治的变动更合适。因而，学者们常常指出，只有正视政府机构与政党之中或其背后的派系、集团与组织，才能反映出中国政治的“真实性”（reality）。但是，资料缺乏常常使人们难以确定：在作者对非正式的政治机构的论述中有多少是关于个人的特殊联系或是中国政治文化特有的类似的特征；它在多大程度上又只是描述了特定时代正式的政治组织或政府机构的非稳定性。可能，人们也会指出德国政治中的“beziehung”（关系）与美国政治中的“connection”（关系）这一相类似现象。但毫无疑问，从中国的哲学与史学中可以发现，它的特殊联系更具普遍性。这些想法能否反映出在中国与其它国家政治生活真实性之间的差异？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在量上还是质上？

家博先生是第一位在广泛的实地调查以及在对历史档案和报刊新闻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人的特殊联系即他称的“关系”作实证研究的政治学学者。在台北学习一年后，他便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在选取台湾一个乡村以作深入研究时，他又研修了人类学研究方法，并化相当长的时间整理分析了他所收集到的材料。当在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研究院中获得其教职后，他又返回他以前所作实地调查过的乡村，在那儿，他观察到了三次地方选举。

正如这系列研究中的先前两卷一样，家博博士的研究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不断扩大的影响。

当代中国出版公司总编
傅因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妈祖乡	(5)
一、台湾行政体系中的乡与村	(5)
二、妈祖乡的土地和人民	(8)
三、妈祖乡各村	(10)
第二章 官僚政治体制	(20)
一、乡与村政府	(21)
二、人民团体	(35)
三、国民党	(39)
四、政策的贯彻：改善民俗的实践	(48)
五、结论	(58)
第三章 关系的概念	(60)
一、关系模式	(60)
二、关系基础的分析	(61)
三、关系的类型：集体与“一对”	(76)
四、关系的动力	(80)
五、竞争关系的解决：个案研究	(89)
六、结论	(91)
第四章 团结、面子与派系	(93)
一、团结	(93)
二、面子	(98)
三、团结等于面子吗？	(102)
四、派系研究方法	(104)

五、派系的定义	(108)
六、领导核心	(111)
七、派系支持者	(120)
八、妈祖派系的结构	(123)
九、妈祖的派系	(126)
十、结论	(129)
第五章 妈祖乡派系结盟与分裂的文化基础	(131)
一、妈祖乡市场体系架构	(133)
二、妈祖乡的亲戚网	(136)
三、关于亲戚网的另外五点调查结论	(140)
四、妈祖乡宗教体系	(142)
五、行政区划的作用	(148)
六、四个较有用的假设	(158)
七、结论	(164)
第六章 妈祖派系之缘起与发展 (1951—1971年)	(165)
一、台湾政治派系之缘起	(165)
二、过渡时期 (1945—1950年)	(167)
三、派系的雏型 (1951年)	(170)
四、“酸糖” (1953年)	(177)
五、春来北部 (1954—1958年)	(180)
六、南派时代 (1958—1964年)	(186)
七、北派东山再起 (1965—1971年)	(197)
八、A村派系的发展	(205)
九、结论	(213)
第七章 妈祖派系与选举 (1972—1973年)	(214)
一、选票购买	(214)
二、1972年12月23日选举	(216)
三、1973年3月17日乡长与县议会选举	(235)
四、结论	(253)

第八章 国民党的发展与派系的重新组合（1973—1979年）

.....	(255)
一、县议员梁英狄的被监禁与撤职.....	(256)
二、1973年10月6日村长与乡民代表会选举.....	(258)
三、1973年11月乡民代表会主席选举.....	(260)
四、国民党干预农会理事长选举.....	(263)
五、乡民代表会“颂扬”区党部缪书记.....	(264)
六、A村解决了庙产争执.....	(265)
七、1977年11月19日选举中对国民党提名的竞争.....	(267)
八、“违纪”候选人与北派之分裂.....	(277)
九、1977年11月19日选举中的竞选.....	(281)
十、1977年11月19日的选举结果.....	(293)
十一、妈祖乡新的派系结盟.....	(297)
十二、新政治结盟之明朗化（1977—1979年）.....	(298)
十三、结论.....	(301)
结束语.....	(303)
参考书目.....	(310)
译后记.....	(330)

前 言

在过去的30年中，一些西方学者已把相当大的努力付诸中国政治的研究，绝大多数的分析仅依赖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所能看到的资料：书面材料、对个别人的访问和情报报告，而没有在中国的环境中来观察与分析。虽然，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年已允许外国学者（包括我本人）访问中国大陆，在那儿他们可以对中国有一个“感性”认识，但在中国却很少能对政治进行长期研究。^①

1970年，当我开始筹划本书的研究时，我强烈地意识到局外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很少能实际观察与报道中国的政治体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外代表的探询，即清楚地显示实地研究在中国大陆并不成熟。1965—1968年在台湾的先期逗留使我深信，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决定在台湾乡村寻找一个地方进行政治实地研究。这样的研究至少可以告诉我台湾一小部分地区的政治，大概还能明了台湾其它地区及其高层的政治。最后，我希望它也有助于政治研究中的横向文化比较。

读者在最终必须鉴定本书是否完成了这些目标中的最基本部分。每个地方都有其特性，但妈祖乡看来是台湾乡村中的典型。在实地研究期间，我对台湾高层次政治获得了相当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对妈祖政治理性的分析也有

^①中译本注：该书完成于1980年，其时中国大陆的改革刚刚开始。

助于对中国大陆政治的研究，而这确实也为曾研究过中国政治的学者所证实。我希望，对团结、“面子”和派系组织与运作的分析也同样有更广泛的作用——不仅对中国大陆，而且对古代中国（它同样不能被观察）。

在20世纪70年代中，我在妈祖乡生活了较长时间。1971年10月，刚抵达台湾时，我首先在高雄市作了6周初步的实地研究。在那儿，既获得了实地研究方面的经验，又熟悉了台湾地方政治。对妈祖乡最初的实地研究是在1971年12月至1973年3月间进行的。有幸的是，1976年7—8月，1977年11—12月，1978年1—2月和1979年5月，我又先后四次在妈祖乡展开了深入研究。这样，与大多数依靠口述和文献记录作历史透视的实地研究形成对比，妈祖资料既依赖口述和文献记录，又建立在一个持久的观察发展上。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妈祖乡居民、领导以及更高层次官员给予的合作和深厚的友谊使得资料更为丰富，它超过了我原先最乐观的估计。

本书第一章描述了实地调查的地点。妈祖乡大约有28000名居民，他们居住在被合并成18个行政村的23个自然村中。第一章界定“乡”与“村”在台湾行政体系中的地位，然后介绍妈祖乡及其每一个村。第二章分析了正式的政治组织，即“政府”、人民团体、国民党。在低层的乡一级，“官僚政治体制”中的参与者很少有机会制定政策，他们的作用是贯彻政策。第二章以这种政策贯彻的案例研究——“改善民俗的实践”结束。

第三、四、五章介绍了从妈祖乡政治体制研究中推导出的最主要的分析构架。第三章首先考察了关系的关键性概念，即中国人的特殊的联系。妈祖居民利用关系结成政治性联盟，关系越“亲密”，越有可能政治结盟。接着，叙述了关系

的类型，例如：同乡、亲戚、同事和同学，分析了它们在妈祖政治中相应的效用。随后，讨论关系的动力，即妈祖居民如何利用“社会来往”与“使用与帮助”的进程来发展与保持政治上的有用关系。

第四章考察了妈祖领导追求的目标与达到这些目标的组织方式。妈祖领导们寻求公众的“团结”与私人的“面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来达到这些目标的派系组织却使“团结”变得不可能，并经常丢掉“面子”。由关系联结的妈祖派系都是集体领导。其它的观察者们强调派系的纵向属性，但在妈祖，派系的横向联结也相当重要。这些关系、团结、“面子”与派别的分析构架似乎也适用于对中国政治体制等其它方面的研究。

妈祖乡有两个派别，南派与北派。第五章揭示了连结各个派别的关系在乡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行政体系中的发展。在妈祖，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体系在高度的相互依存、统一的文化体系中彼此间相互作用。

第六、七、八章对1945年台湾光复以来妈祖政治发展作了分析性叙述，这种叙述具有五种功能：首先，它提供了在第三、四、五章分析中所运用的例子的背景；其次，它显示了妈祖政治随时间而变化；第三，它用较多的篇幅描述了关键性的材料，如妈祖派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影响妈祖政治的关键性关系；第四，它给读者提供了足够的资料来检测分析的构架，如果需要，提出可供选择的解释；最后，它还显示了在妈祖乡观察到的政治体制的一些“特色”。

第六章揭示了妈祖派别的起源与发展早于1971年的首次实地研究。正如台湾大多数地区那样，妈祖派别发展起源于1951年的普选。本章重点分析乡级派别，但也兼及了某一村

庄派别的发展和乡与村派别间的关系。

第七章叙述了第一次实地研究中两次“重要事件”：1972年12月23日与1973年3月17日选举。在第一次选举中，候选人寻求高层次的公职，但第二次选举中，选民选举乡级重要的公职人员——乡长和县议员。人们参与台湾地方政治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选举中赢得公职，从而获得“面子”。这一章详细提供了这一引人注目进程中的两个案例研究。

1973年初第一次实地研究之后所从事的四次短期的实地研究，揭示了其后乡级的两个重要发展趋向：第一，国民党地方党组织日益强大，并且开始在妈祖乡以至台湾所有地区的乡村政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导致了国民党与地方政治领导人之间冲突的增多，结果，在1977年11月19日选举中，国民党遭到重大“失败”；第二，这次选举导致了在1965—1977年间一直支配妈祖乡政治的北派的分裂。基于上述研究，第八章随之分析了第三个选举案例。

第一章 妈祖乡

本书分析了台湾一个拥有23个自然村、28000人的乡中的政治。出于对台湾人民所爱戴的妈祖神的尊敬，我们称该乡为妈祖乡。本章首先界定“乡”和“村”在台湾行政体系中的地位，然后，描述妈祖的土地与人民，最后对乡中每个村作一番简短的巡视。

一、台湾行政体系中的乡与村

台湾的行政体制有六级：“中央”、省、县、乡、村与邻。但是，只有前面四级设有官僚机构；村里的一名专职官员属于乡政府的编制。都市中也有相对应的组织层次（见表1-1）。

台湾当局现管辖3个省级单位，台湾省、台北市和高雄市。1967年7月1日，台北升为“院”辖市，而高雄则在1979年7月1日升为“院”辖市。“院”辖市必须是大都会，人口超过100万，或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①

台湾省的16个县和3个县级市平均人口约为70万。^②县级市的必备条件是：省的首府；或是人口20万以上，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且人口超过10万。^③

①陈鏐波：《行政学新论》，第75页，台北，考政出版公司，1971年修订本。

②译者注：该书出版后，台湾地方行政体系有所调整，增加了县级市的数目。到1988年底为止，计有5个省辖市。

③同①。

乡级单位有四类：乡、镇、乡级市和市区。乡和镇彼此很类似，主要的区别在于镇中有一个集镇存在。原则上讲，镇中的通讯、商业和工业较之乡要更为发达些，但尚未以人口标准来区别这两者。在官方文件中，也是“乡镇”并列，可见这两乡级单位相似。1976年底，台湾省有231个乡和69个镇。^①

人口超过15万，工商业的某种程度的发展，较好的财政金融网，便利的通讯和较完备的公共设施都是成为乡级市的必备条件。^②1976年底，台湾有13个乡级市。^③

市的区（有时译作行政区）现在与其它3个乡级单位截然不同。作为“法人”或者自治机关，乡、镇以及乡级市都有普选产生的行政官员和代表会及独立的预算。1960年，区失去了它独立的法人地位，成为市政府的组成部分之一。^④随之变化的包括代表会的取消，区行政官员的任命代替选举，独立的区预算的废除，还有区行政机关任务与组织的缩减和简化。

乡下面设有行政村。在台湾，一个大的自然村可能被划分为两个或者3个行政村，两个或更多的自然村也可能被合组为一个行政村，也有的行政村边界和某个自然村边界完全吻合。就妈祖乡而言，在自然村和行政村边界关系中，上述3种情况都存在。这为基于自然、社会与经济体系之上的行政边界如何既影响政治，又影响社会经济体系的研究提供了

①《1976年“中华民国”台-闽人口统计》，第6页、第16页，台北，1974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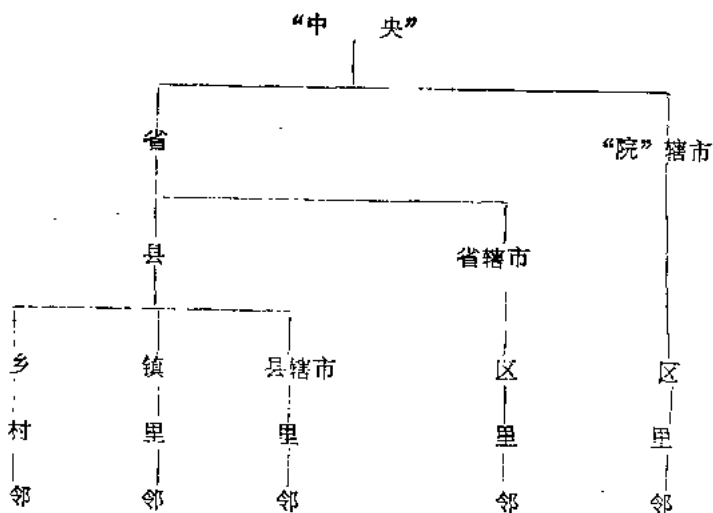
②《台湾省地方自治法规》，第67页，台中，台湾省政府民政厅，1977年8月。

③同①。

④《台湾省地方自治志要》，第377页，台中，台湾省地方自治志要编辑委员会，1965年。

一个极好的机会。

表1-1 台湾的行政结构



在镇和各种不同等级的市中的村级单位称作里。在镇和市的农村部分中，里与村很难分得清，但是，在大的市镇和城市里，里相当于都市的“分区”。

所有的村级单位，不管是在农村还是都市地区，都有普选产生的村（里）长，一个由任命产生的村（里）干事和村民大会。^① 1974年底，台湾省有3176个村和3465个里，即是说，村级单位总计有6641个。^②

按照现在规则，村中的邻由10—30户组成，而里中的邻由20—50户组成。^③ 邻长几乎没有什么大的独立的政治作

① 参见第二章。

② 《台湾光复30年》，11—1—10，台中，台湾省政府新闻处，1975年。

③ 《台湾光复25》，11—17，台中，台湾省政府新闻处，1970年。

用，但当“政府”与政治家必须在一个短时间内与每一个家庭相交往时，则必须利用邻长。1974年底，台湾省共有95769个邻。^①

二、妈祖乡的土地和人民

妈祖乡所在的孔雀县^②的人口与面积在台湾省各县中均属中等，与妈祖乡接界的7个乡镇单位都属于孔雀县。其中包括南部的南市和北部的北镇（见图1-1）。南市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不但为全孔雀县服务，而且也为邻县农村服务。北镇则是其相邻6个乡的商业中心。与妈祖乡接壤的其它5个乡镇单位像妈祖乡一样，都是乡。

妈祖乡与它相邻乡、镇一样，不临大海，位处平原。1973年底，每5个就业的妈祖居民中有4个以上从事农业生产，而不足1/7的人从“政府”雇佣和其它服务业中赚得他们的生活费用，不足1/27的人在制造业部门工作。^③其后，外来的投资者建造了几个小型工厂。到1976年底，从事制造业人数已是过去的两倍。当然，农业仍然是妈祖乡的经济支柱：3/4的人从事农业生产，1/13的人在制造业部门工作，1/7的人在“政府”部门与服务业部门工作。孔雀县其它乡中只有一个乡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比例比妈祖乡高。^④

其它的统计进一步显示了妈祖乡的农业状态。居民耕种着乡里总土地67平方公里（6700公顷）中的95%，总土地的86%用于农业生产。灌溉率达农业用地的92%，在孔雀县，平原乡中比率最高。主要的作物包括水稻、甘蔗、甘薯、甜

①《台湾光复30年》，11-1-10，台中，台湾省政府新闻处，1975年。

②化名。

③《1973年台南地区家庭统计报告》，第870—885页，台北，1974年12月。

④《1976年“中华民国”台-国人口统计》，第218—219页。